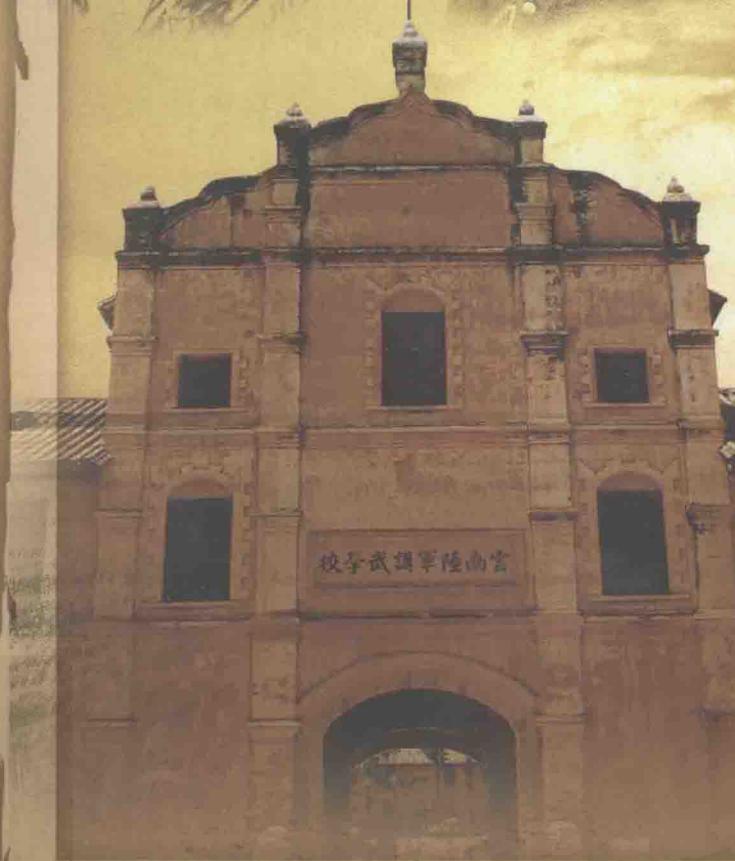


雲南講武堂
將帥錄

◎陳子歡編著



广州市宣传文化出版资金



广州出版社



广州市宣传文化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雲南譜武堂
將帥錄

◎陳子歡

編著

二〇一一年·广州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南讲武堂将帅录 / 陈予欢编著 .— 广州 : 广州出版社 ,2011.3
(现代中国著名军校将领传记书系)

ISBN 978-7-5462-0450-5

I .① 云… II .① 陈… III .① 军事人物 - 列传 - 中国
- 现代 IV .①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2873 号

云南讲武堂将帅录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地址 : 广州市天润路 87 号九、十楼)

邮政编码 :510635

网址 :www.gzcbs.com.cn)

责任编辑 冯少贞

责任校对 梁玲

封面设计 谢成华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地址 :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

邮政编码 :511447)

规 格 787 毫米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8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462-0450-5

定 价 68.00 元



雲南陸軍講武學校





开 篇 语

创办于1909年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一所在我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声名显赫的著名军事院校，有“黄埔军校摇篮”、“中国革命熔炉”之盛誉，与保定军校、东北讲武堂并称为近代中国三大著名军校。在风雷激荡的革命战争年代，云南陆军讲武堂始终秉承“坚忍刻苦”的校训，唱响慷慨激昂的《云南讲武堂校歌》，创制严厉规范的《云南陆军讲武堂章程》，坚持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训练，初步形成了新式军事教育体制，为加快近代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26年校史中，不仅仅书写着军事教育上的辉煌成就，更值得世人关注的是，它先后培养了近万名杰出军政人材，其中既有中华之英才，又有异国之精英；既有战功赫赫的军事将领，又有功绩卓著的开国元勋，可谓将星云集、名帅辈出。他们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挺立潮头，勇担重任，大有作为，在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史上谱写下一卷又一卷壮丽诗篇。

百年沧桑、硝烟散尽，白驹过隙、时移世易。云南陆军讲武堂虽历逾百年，但从那里走出的将帅们在历史的天空中依然星光熠熠、光芒闪耀。他们的名字，理应为青史所镌刻，也必将为青史所镌刻；他们的壮举，理应为后世所传颂，也必将为后世所传颂。《云南陆军讲武堂将帅录》正是这样一部关于讲武堂众将帅的人物传记和人物辞典。作者陈予欢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军史专家，在近现代军校史方面著述颇丰。《云南陆军讲武堂将帅录》是予欢先生所作“现代中国著名军校将帅传记书系”的其中之一，也是其继《黄埔军校将帅录》、《保定军校将帅录》、《陆军大学将帅录》之后的又一部力作。该书收录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上近1500名军事统帅、杰出将领及知名人士的传记，其中60%的人物资料在书中首次独家呈现，50%的人物传记配有个人军戎历史照片，史料基础扎实，史学功底深厚，具有图文传真与史料留存的双重价值，填补了我国近现代军事史研究的一项空白，也成就了国内外第一部集中反映西南地区、辐射影响中华大地的军事历史人物著述。

云南陆军讲武堂历经一个多世纪战火的洗礼和岁月的涤荡，如今遗址尚存，并于1988年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自洋务运动以来保留最完整、规模最宏大、历史最悠久的著名军事院校。无论是讲武堂本身，还是在其身后的众多将星帅才，都绝不仅仅是史书中的一个篇章，更是一种弥足珍贵、砥砺后人的精神财富。因此，我们应当感谢予欢先生，为我们记录了那些将帅，还原了那段历史，保留了那种精神。当前，昆明正处在大开放、大变革、大发展的关键阶段，勤劳、智慧、勇敢的昆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加快实现科学发展新跨越的历史征程。越是在这样的重要时期，越需要我们牢记革命先驱们为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所作出的奋斗和牺牲，越需要我们汲取和弘扬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和矢志不渝的爱国精

神，构筑新时期昆明的城市精神和城市灵魂，为推进昆明跨越式发展提供强劲持久的精神动力。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将帅录》即将付梓之时，予欢先生邀我作开篇语。细细读来，感慨良多，故作上文，是为开篇。

仇 和

2010年10月于昆明

(仇和：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中共昆明市委书记)

序　　一

我与陈予欢先生相识，还是最近的事情。他的直率、热情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位中年业余学者，在最近十多年间，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大部头的军事人物和军事学术著作近 20 种，总字数超过 1500 万，这是令人震惊的，也是令人兴奋的。其中《黄埔军校将帅录》还获得了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和广东省优秀图书一等奖，这是非常难得的。近日我读到他洋洋大观的 45 万字的新作《初露锋芒——黄埔军校第一期生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4 月版），受益匪浅，深感震撼。该书资料之丰富，探讨之深入，在同类著述中是罕见的。

予欢先生即将完成另一巨著《云南讲武堂将帅录》达 85 万字，收录云南陆军讲武堂（以下简称云南讲武堂）师生中的军事统帅、杰出将领和名人传记近 1500 人，约占云南讲武堂培养全部学员 9000 多人的 17%，这又是一件令人非常高兴的事。作为业余学者能做到的事，而我们专业学者却未能做到，不能不令人汗颜和惭愧。云南讲武堂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系统的资料未能保存下来。虽经多年来的收集，但至今为止，我们连全部 22 期学员的名单和教职员的名单都没有完全掌握，其他重要历史文献掌握得也不多。我们对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这样的条件下，予欢先生能够收集到近 1500 人之多的传记资料，其艰辛和刻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也是令人敬佩的。

予欢先生希望我能为《云南讲武堂将帅录》一书写个“序”或“前言”，出于对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崇敬，也出于对予欢先生辛勤劳动的感激，我是应当尽力的。这个“前言”主要是对云南讲武堂作一评介，以为予欢先生巨著之引子。

一、云南讲武堂，近代云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亮点

云南讲武堂的旧址，今天仍然耸立在昆明翠湖之滨，在我国近代著名军校中，是保存比较完好的一所。作为著名军校的云南讲武堂之所以能够产生，与它的特定时代和地域是分不开的。

历史发展进入近代以后，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民族风情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背景，为云南扮演有声有色、引人注目的角色创造了机遇和条件。近代云南历史发展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分量加重了，亮点也增多了，而且在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以及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多次取得局部胜利等方面，在全国都是很突出的。

仅以 20 世纪上半叶为例。从政治上说，于 1915 年从云南开始爆发的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1945 年从云南开展爆发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都影响了全国。从经济上说，于 1912 年建成的中国第一座水力发电站（石龙坝水电站），影响深远；于 1938 建成的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随后又开辟了驼峰航线，支撑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教育上说，20 世纪前半叶，云南有两所影响很大的一文一武的学校，“一文”是西南联合大学，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一武”就是云南讲武堂，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从军事上说，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运动，滇军打出了名，有所谓“滇军精锐，冠于全国”之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有滇军

在台儿庄、中条山等战役中的杰出表现；而且滇西抗战，更成为把日本侵略者全部赶出中国土地最早的地区，成为抗战最后胜利的先声。从文化上说，20世纪30年代，聂耳作曲的一支歌《义勇军进行曲》，曾激起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艾思奇写作的一本书《大众哲学》，当时就有动员了10万青年参加革命的说法，有趣的是聂耳与艾思奇都是云南籍的文化名人。

近代云南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近代云南历史上这些闪耀着光辉的亮点，为云南以至近代中国历史留下了辉煌的篇章。云南讲武堂是这些亮点中非常耀眼的一座丰碑，它成了今天昆明引人注目的历史文化名片、近代云南历史辉煌的亮点。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昆明，没有云南讲武堂的话，将是不可想象的。

二、黄埔军校创办的过程，凸显了云南讲武堂的历史地位

早在清末民初，云南讲武堂就颇负盛名。龙云将军的大儿子、曾是云南讲武学校（讲武堂在民国建立后改名为讲武学校）学员的龙绳武将军在其回忆录中说：“云南讲武堂和保定军校、东北讲武堂并称中国三大军校，是清末为了训练新军而成立的新式军校。”^① 这里没有提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因为在清末民初，黄埔军校尚未出现。这就是说，早在黄埔军校建立以前，云南陆军讲武堂就已经出名了。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之时，云南讲武堂已经走过了15年的历程。固然，黄埔军校由于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培养了众多的名将（国民党、共产党双方都有许多名将来自黄埔军校），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影响，为中国近代历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其后来的影响，显然超出了云南讲武堂。但是，不能因此就漠视云南讲武堂的历史地位，也不能简单地说，云南讲武堂是“云南的黄埔”。

其实，从历史发展角度考察，不是黄埔军校影响了云南讲武堂，而是云南讲武堂多方面影响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后来之成名，云南讲武堂有着很大的功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黄埔军校是“广州之云南讲武堂”，至少可以说，云南讲武堂对黄埔军校有重要影响。如果没有云南讲武堂，很难想象有后来黄埔军校的业绩。黄埔军校对云南讲武堂的历史继承是难以否认的。

这里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加以说明。第一，云南讲武堂的重要教官及若干师生成了黄埔军校创办时的骨干和建设的重要力量。第二，云南讲武堂使用过的辅导教材成了黄埔军校“人手一册”的重要读物。

首先，我们说第一个方面，云南讲武堂的重要教官及若干师生成了黄埔军校创办时的骨干和后来建设的重要力量。

据云南省图书馆存手抄稿本《云南军事学校教育史略》一书记载，1924年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时，新式教官甚为缺乏，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根据孙中山的指示，给云南来电，调云南讲武堂主要的四大兵科科长去黄埔军校担任要职。结果是云南讲武堂的炮兵科科长、后任教育长的王柏龄，工兵科科长帅崇兴，步兵科科长刘跃扬，骑兵科科长林振雄及部分讲武堂毕业生进入黄埔军校，协助创办黄埔军校。这四名重要教官到黄埔军校后，都被委以重任。其中，王柏龄成了黄埔军校领导班子成员，又兼教授部主任；林振雄亦为黄埔军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① 张朋园：《龙绳武先生访问纪录》第15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5月版。

管理部主任；^① 帅崇兴、刘跃扬也在黄埔军校任要职。这些记录，可以从《孙中山全集》、《蒋介石日记》以及有关黄埔军校史的书中查到。所以《云南军事学校教育史略》一书作者乐铭新说：“武校精神，训练黄埔健儿，造成光荣历史。”^②

除了四大兵科科长外，我们还可以举出由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学员到黄埔军校担任重要职务的事例。如：叶剑英，云南讲武堂第十二期学员，1924年应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凯的邀请，参加黄埔军校筹备工作，任教授部副主任兼教官；徐成章，原名徐天亮，云南讲武堂第十二期学员，1924年受聘黄埔军校上尉特别官佐；严凤仪，原名銮海，云南讲武堂第十一期学员，1924年受聘黄埔军校学生队第四队副队长；杨宁，又名扬林，原名金勋，云南讲武堂第十六期学员，1924年受聘黄埔军校学生队中尉教官，后任学生总队第四队上尉队长，再任军校技术部主任教官，中校军衔；崔庸健，又名石泉，云南讲武堂第十七期学员，后为黄埔军校教官；等等。众多的云南讲武堂师生成为黄埔军校的重要教官，说明云南讲武堂对黄埔军校的作用不可低估。

其次，我们再说第二个方面，云南讲武堂使用过的辅导教材成了黄埔军校“人手一册”的重要读物。

1911年初青年将军蔡锷来到云南，担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旅长）之前，曾编辑一部《曾胡治兵语录》的兵书。这部兵书从清末名将曾国藩、胡林翼两人著作中选择有关治兵的言论、语录，分为教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敢、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十二类，分类辑录。每类辑录之后，都附有蔡锷的精彩按语。这部语录是蔡锷训练新军时，代“精神讲话”所用，^③ 也曾作为云南讲武堂的辅导教材。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校长蒋介石看中了这部语录，亲自增辑“治心”一类，加序言再版印行。蒋介石在序中说：“吾故择曾、胡治兵之语之切要者，另列一目，兼采左季高（左宗棠）之言，可为后世法者，附录于其后。”“曾、胡、左氏之言，其言简，不惟治兵者之至宝，实为治心治国者之良规。愿本校同人各一编，则将来治军治国均有所本矣。”^④ 云南讲武堂的辅导教材，又成了黄埔军校“人手一册”的读物，可见云南讲武堂对黄埔军校影响之深，是不言而喻的。

从上述两方面可以看出云南讲武堂对黄埔军校的重要影响，凸显了云南讲武堂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三、杰出的人才，辉煌的战绩，是云南讲武堂形象的两大支撑点

云南讲武堂创办于1909年，1912年改称云南讲武学校，结束于1935年，共创办22期，先后招收学员9000余人。^⑤

^① 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派蒋介石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委员七人：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七人中原云南讲武堂教官即有二人。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56页，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

^② 乐铭新：《云南军事学校教育史略》，云南省图书馆藏手抄本。

^③ 刘达武编：《蔡松坡先生遗集》之一《曾胡治兵语录》第1页，湖南邵阳亚东印书馆1943年版。

^④ 《曾胡治兵语录·蒋序》，见《蔡松坡先生遗集》之一；又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56—257页。

^⑤ 云南陆军讲武堂（学校）原只办19期，于1929年结束。龙云主政时，续办教导团3期，后经批准将这3期改为讲武学校20、21、22期，延续至1935年结束。在26年中，讲武堂共办22期，招收学员9000余人，或曰近万人。目前，因讲武堂学员名册尚未搜集完备，准确的学员数字有待时日才能弄清。

在这 26 年里，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包括著名的革命家和杰出的军事家。在云南讲武堂师生中，曾担任国家领导人的有：朱德，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根源，曾任北洋政府时期农商总长兼署国务总理；张冲，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唐继尧，曾任南方政府军务院抚军长、广州军政府元帅（未就任）。此外，朝鲜的崔庸健，曾任朝鲜人民军总司令、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韩国的李范奭，曾任大韩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兼国防部长；等等。

据现有不完全的资料，在云南讲武堂师生中，担任过上将或省长级别的军政长官约有 40 人，他们是：蔡锷、唐继尧、李烈钧、龙云、卢汉、杨杰、罗佩金、顾品珍、李鸿祥、谢汝翼、胡若愚、刘祖武、赵又新、庾恩旸、叶荃、张开儒、唐继虞、邓泰中、朱培德、金汉鼎、孙渡、范石生、王均、江映枢、卢焘、胡瑛、曾万钟、杨希闵、杨体元、肖毅肃、何海清、盛世才、朱鼎卿、刘存厚、杨森、赖心辉、唐淮源、王甲本、刘震寰等。

在云南讲武堂师生中，担任过中将或军长的也有 40 多名，他们是：周保中、曾泽生、王兆翔、吴和宣、郑开文、鲁子材、黄毓成、唐继麟、叶成林、赵钟奇、周开勋、鲁道源、高荫槐、方声涛、万保邦、韦杵、罗启疆、杨宏光、甘芳、李雁宾、陈维庚、周永祚、赵德恒、寸性奇、张舜臣、朱旭、龚传文、李谦、马锳、马轸、杨蓁、杨如轩、祝鸿基、马继武、卢浚泉、安恩溥、罗树昌、蒋光亮、周体仁、李文彩、赵诚伯、谢崇文、龙泽汇、余建勋等。

担任少将及师长的人更多。

云南讲武堂创办至今近百年之久，所以被人称为“百年军校，将帅摇篮”，被誉为“帅星闪耀，名将辈出”。^①

上述这些高级军事政治人才，许多都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为中国或世界历史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云南讲武堂在它短短的 20 多年里，培养如此众多的杰出人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而云南讲武堂师生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若干次重大的战役、战斗中，也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无论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有云南讲武堂师生的身影，并作出了重要贡献。

例如，在 1911 年的辛亥昆明重九起义和腾越起义中，就是直接由同盟会员、云南讲武堂师生李根源、唐继尧、刘存厚、黄毓成，以及彭蓂、李学诗等人策划、参与发动的。辛亥重九起义后，建立的新政权——云南军都督府的领导班子成员，几乎全部是云南讲武堂师生。云南都督蔡锷虽然不是云南讲武堂的正式教官，但他在那里讲过课，可以算是兼职教官。所以朱德在回忆中说：“教官之一就是协统蔡锷。”^②

在 1915 年至 1916 年的反对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的护国战争中，云南讲武堂师生更是中坚力量。反袁护国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滇军争得了荣誉，更为讲武堂师生争得了骄傲。护国战争在云南的主要策划者、发动者，几乎全是云南讲武堂师生。在护国三个军的营长以上军官 69 人中，云南讲武堂师生有 59 人，占 85.5%。如果从护国第一军主力（不包括贵州部队）来看，营长以上军官，云南讲武堂师生更占到 90% 以上。正因为如此，反袁护国战争胜利以后，云南讲武堂的名声大震，

^① 参阅云南陆军讲武堂文管所编：《百年军校，将帅摇篮》（陈列大纲）打印稿，2007 年。

^② [美]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 100 页，三联书店 1979 年版。

从 1916 年底开始，华侨青年、越南青年、朝鲜青年等纷纷慕名来到讲武堂学习。据不完全统计，1916 年以后，进入云南讲武堂的华侨学生有 500 多人，朝鲜籍学生 30 余人，越南籍学生 70 余人。^①

在 1926 年至 1927 年由广东出发进行北伐战争的历程中，云南讲武堂师生积极参与北伐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如朱培德、王均先后任军长的北伐第三军，以滇军为主，云南讲武堂师生在第三军中人数不少。叶剑英为第四军参谋长，金汉鼎为独立十六师师长（后为第九军军长），杨杰曾任第六军、第十八军军长等，都为北伐战争作出了贡献。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朱德等毅然发动了 1927 年 8 月 1 日的南昌起义，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起点。

在 1937 年至 1945 年的全面抗日战争中，云南讲武堂师生的贡献更是可歌可泣。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叶剑英所领导的八路军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

在滇军中的云南讲武堂师生龙云、卢汉、张冲以及曾万钟、唐淮源等的浴血奋战，值得大书特书。卢汉、张冲等领导的六十军，在 1938 年 4 月至 5 月间台儿庄战役第二阶段中，坚持 20 多天，阻挡了日寇多次进攻。六十军投入战斗者为 35 123 人，战斗结束时伤亡达 18 844 人，超过一半以上。他们不仅粉碎了敌人由台儿庄直下徐州的企图，也掩护了我军的转移，使数十万大军迅速跳出敌人包围赢得了时间。1941 年唐淮源、寸性奇等率第三军，在保卫中条山战斗中，粉碎敌人多次进攻，最后为国捐躯，更体现了“公忠体国不骄不怯的云南精神”。^② 周保中在东北的艰苦条件下领导抗日联军进行英勇斗争，直到抗战胜利。抗日战争时期，以云南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组成的滇军，出现了众多的抗日名将和抗日烈士，就是没有出现过投降将军和伪军。

在解放战争中，云南讲武堂师生的表现也是令人高兴的。先有 1946 年 5 月潘朔端领导的六十军一八四师的海城起义，后有 1948 年 10 月曾泽生领导的六十军长春起义，最后还有 1949 年 12 月卢汉领导的昆明起义，从而加速了大陆完全解放的历史进程。

云南讲武堂在 20 多年的历程中，培养了如此众多的杰出人才，而这些人才在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战绩辉煌，这就反过来大大提高了云南讲武堂的声望，彰显了其光辉的形象。

另外，我们还要提及朝鲜、越南籍的云南讲武堂学生，他们各自为自己祖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进行英勇斗争，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四大原因，铸造了云南讲武堂的历史奇迹

云南讲武堂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除了特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矛盾尖锐、民族危机深重）外，主要得力于四个方面的因素，这就是：明确的奋斗目标，严格的刻苦训练，活跃的思想教育，优良的教官队伍。这四大原因，铸造了云南讲武堂的历史奇迹。

1. 明确的奋斗目标

云南讲武堂从成立之日起就有自己的坚定的奋斗目标，它体现在“坚忍刻苦”四个字的校训中。^③ 这就是为振兴祖国而坚忍刻苦，为民族解放而坚忍刻苦。云南讲武堂始创时的负责人李根源，对“坚忍刻苦”四个字有着深入的解释。他说：“夫坚忍刻苦者，为学之要，立身之本，岂第军人

^① 马继孔等：《云南陆军讲武堂史》第 14 页，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1941 年 8 月 29 日国民政府命令，见《云南日报》1941 年 10 月 3 日。

^③ 李根源：《雪生年录》（卷一）第 17 页，上海铅印 1930 年版。

为然，而于军人则尤切。军人者，牺牲一身，以靖献于国家者也。故身非其身，而国家战斗团体之一员也。军人之生活，坚忍刻苦之生活也；军人之修养，坚忍刻苦之修养也。极而言之，战争之结果，坚忍刻苦之成绩试验也。”^①

一切为了国家民族，这是坚忍刻苦的归宿。抗日战争时期，李根源把“坚忍刻苦”之精神，归结为“云南之精神”，^②又进一步解释为“拼命”精神，“拼死”精神，^③为振兴国家、民族而拼命、拼死。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云南讲武堂创办之初就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加强管理，以保障目标的实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有《云南陆军讲武堂试办章程》、《改订云南陆军讲武堂章程》、《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章程》、《陆军讲武堂内务规则》等。

2. 严格的刻苦训练

云南讲武堂从创办之日起，就规模较大，班级较多，学制较长，课程设置完善。更重要的是严格的刻苦训练，不允许有任何苟且马虎。辛亥革命前的讲武堂是这样，辛亥革命后的讲武学校也是这样。据朱德回忆，辛亥前他在云南讲武堂学习时，学校的制度和作风仿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纪律非常严格，每天上六小时课，下两小时操。”^④早晨有体操和跑步，晚上还有自习，而且夜间睡觉以后常有紧急集合的训练。

辛亥革命后的1917年，李范奭进入云南讲武堂，他回忆说：“云南军官学校的军事教育由日本士官学校和法国双世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担任，实行非常严格的‘军国主义’教育，也叫‘逆行教育’，用现代人的话来讲就是‘非人道主义’的野蛮教育。”又说：“林振雄教官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训练也很艰苦。训练没几天，你就会变成另一个人。”他感叹：“训练实在太苦了。”^⑤

从辛亥前后两位不同国家的当事人的回忆，使我们可以想象，讲武堂训练的严格和刻苦。能够经受如此刻苦训练的学生，其水平是可想而知的。

3. 活跃的思想教育

云南讲武堂在课堂上、在训练场上要求十分严格。与此同时，活跃的思想教育工作也跟了上去，使学员们在军事技术、思想教育方面获得双丰收。

在思想教育方面，除了制定“坚忍刻苦”的校训外，还制作了系列军歌。歌词慷慨激昂，富有感染力，每晨早操都要集中唱讲武堂军歌。军歌有多首，其中最主要的一首军歌歌词是：“风云滚滚，感觉他黄狮一梦醒。同胞四万万，互相奋起作长城。神州大陆奇男子，携手从军去。但凭着团结力，旋转新乾坤。哪怕它欧风美雨，来势颇凶狠。练成铁臂担重任，壮哉中国民！壮哉中国民！”^⑥

在建校之初，无论在课堂上、训练中，或野外实习，尤其是精神讲话时，教官们常利用各种方

^① 《韶州讲武堂第二期学生入学训词》，见《曲石文录》（卷二）第17~18页，苏州铅印1935年版。

^② 《云南人的真精神》，见《曲石文续录》（卷四）第1~5页，昆明铅印1941年版。

^③ 《拼命》，见《曲石文续录》（卷四）第11~14页，昆明铅印1941年版。

^④ 朱德：《辛亥回忆》，见《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0日。

^⑤ 《铁骥·李范奭自述》，韩文1991年版；据中文翻译2007年打印本，见《云南陆军讲武堂与韩国复国运动学术研计会》（昆明）文集第71页。

^⑥ 李根源：《曲石诗录》（卷十六）第9页，昆明铅印1978年版。

式，如暗示、举例、隐喻等来宣传反清革命思想。例如，李根源对学员讲述明初将领沐英驱逐元朝在云南的统治势力的事迹，并建“思沐小墅”于讲武堂西南隅。他说：“思沐，志在匡复。”^① 宣传反清复明思想。又如，1910年4月，法国修筑的滇越铁路通车到达昆明，李根源召集学生讲话说：“法国今天将滇越铁路修抵昆明，我们国家不惟修不起铁路，甚至将国家主权拱手送给外国人。我辈军人，有守土卫国之责，大家在校应该努力学习，将来誓必雪此耻辱。”他决定放假一天，要大家去火车站看看。讲话慷慨激昂，讲到痛心处，不禁痛哭流涕。这一天学员们到车站去，见到法国人耀武扬威，大家悲愤交集。回校后，国文课以《看滇越铁路通车后的感想》为题作文，使学员们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②

与口头宣传、现实教育相结合，革命的书刊在讲武堂中也秘密流传，进步学生争相传阅。这些书刊有《民报》、《天讨》、《国粹学报》、《汉声》、《汉帜》、《南风报》、《警世钟》、《猛回头》、《夏声》、《洞庭波》、《云南》等。同盟会还在讲武堂中发展会员，建立组织。

辛亥革命以后，讲武学校思想教育的内容有所变化，要求也不一样，但活跃的思想教育仍是云南讲武堂的一个传统。

4. 优良的教官队伍

云南讲武堂的教官队伍，从建校之日起，就聘请了大量优良教官。建校之时聘请了大量回国留日学生任教官，如李根源、李烈钧、方声涛、赵康时、沈汪度、唐继尧、庾恩赐、顾品珍、刘祖武、李鸿祥、李伯庚、罗佩金等，这些教官后来历史证明都是优秀的。

上述教官军事技术过硬，思想也颇为先进。从政治上考察，云南讲武堂建校之初的47名教职员中，有同盟会员17人，革命分子11人，倾向革命者8人，政治态度不明者11人，没有发现明显的反动分子。从学历来看，受过新式教育的占绝对优势，已知担任教官的40人中，日本各学堂毕业的28人，就学于北京京师大学堂者4人，就学于越南巴维学校者2人，情况不明者6人。^③ 这样，建校之初的云南讲武堂，“成了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④，“成了西南团结革命力量的核心”^⑤。

辛亥革命以后，云南讲武堂教官情况有所变化，并聘请了大量外籍教官，特别是日本教官，他们的军事技术都较为过硬。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虽然在课堂上、训练场上教官都是很严肃的，要求甚为苛刻，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师生关系一直比较融洽。例如，李根源曾两次在朱德有难时帮助他走出困境，使朱德甚为感动，并为此建立了终身的师生友谊。朱德与兼职教官蔡锷关系也很融洽，他不仅可以到蔡锷的办公室自由取阅书报，而且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蔡锷多次提拔朱德，使朱德感到蔡锷不仅是他的“良师益友”，还是他的“北极星”。^⑥ 林振雄也十分欣赏叶剑英，教叶剑英劈刀术很认真，常利用课余时间个别教练，使叶剑英劈刀术迅速长进，名列前茅，并战胜了趾高气扬的日本教官。^⑦

^① 李根源：《思沐园跋》，见《曲石文续录》（卷一）第12页，苏州铅印1940年版。

^② 素庵、适生：《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概况》，见《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6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③ 茅海建：《云南陆军讲武堂与辛亥云南起义》，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第76页。

^④ 朱德：《辛亥革命回忆录》，见《朱德选集》第37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⑤ 朱德：《辛亥回忆》，见《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0日。

^⑥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141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⑦ 《叶剑英传》第1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上述四大主要原因，铸造了云南讲武堂的历史奇迹。

云南讲武堂师生们的辉煌业绩，成就了云南讲武堂，并且奠定了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还要提及的是，云南讲武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一所开放性的军校，不仅吸收了大量华侨学生，而且吸纳了朝鲜籍、越南籍的学生等，既使云南讲武堂成为中外军事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更使云南讲武堂成为一所国际性的亚洲著名军校，为亚洲各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云南讲武堂作为我国近代著名军校是当之无愧的。予欢先生为这样的军校著述“将帅录”，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谢本书

2007年8月于昆明云南民族大学

(谢本书：我国研究西南军阀史暨云南讲武堂史料及其人物著名专家、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序二

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我国历来讲文武之道。有文事必有武备。战争的需要和经验总结产生出军事理论。军事理论不仅讲求战略、战术，也包括军事训练的理论、教材和操典。士卒训练固然重要，不教而战，无异驱犬羊而膏虎膾，虽至愚者亦所不为。然而练兵需先练将，即带兵官的训练与教育，成为武备的要着。对此，前人言之甚详，兹不赘述。

自唐代确立“武举”制度以降，开始实行“制举选将”与“乡贡”的武举制度，武科考试遂亦形成制度。实行武举制度，成为男子博官之一途，民间设馆习武之风日盛。到了宋代，在民间军事教育的基础上，成立了官府的“武学”，并逐渐形成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武学教育，以造就军事人材。与此相适应，便是编制了一套完整的军事教材，最基本的便是《武经七书》。这套军事选材制度，迄于明清两代，沿革不易，且益加缜密。在冷兵器的历史阶段，中国的军事教育，至此已发挥到了极致。

明清易代之际，正是西欧经过工业革命经济发展走上快车道的时期。工业的迅速发展带动军工生产的突飞猛进，“船坚炮利”的时代已经到来，世界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而国人却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仍在从事刀矛矢石的比试。而且，国家承平日久，政治腐败，兵备废弛，终于有第一次鸦片战争国门被敲开，战争惨败，割地赔款的惨败，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的变局。

外夷屡屡入侵，使朝廷难以招架。先进的中国人于是倡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实际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洋枪洋炮已为湘淮军领袖所接受，洋枪队士兵，基本上也是中国人。由于满汉蒙古八旗在实战中已充分表明已绝不能用，绿营兵同样腐朽不堪，而洋枪队的创设与训练及战斗力已为主持洋务的大员们所经见与确信，相信“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所以咸丰末年，朝廷有谕准编练练军及湘、淮军的新式训练，即仿照西洋训练阵式，并配以洋枪洋炮新式武器的练兵之策。

清廷将经制军绿营加以改革，量为变通，成立练军，是从直隶开始的，旨在用以拱卫京师。同时，神机营也在北京设立“威远队”，分步马二队，学习使用新式枪炮与西洋阵式；又仿神机营建制，在京城旗营、护军营及巡捕营各挑五千士卒，分为三军，称神武营，为京城防卫之用。一些省份相继效法，组织洋枪队。毋庸置疑，直隶练军之设，湘、淮军及各省练军之编练，实际启动了清军近代化的进程。然而，从整体上而言，清军体制与官兵素质并未因此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如不进行彻底改革，清王朝对外决无国防之可言，对内也无法震慑国民之反抗。庚子事变，便使之有切肤之痛。

中国军事现代化，包括军事教育在内，是与洋务运动一齐起步的。19世纪60年代，福州船政局与船政学堂创立，是中国近代新式军事教育的开始。随后，天津水师学堂创办，各省水师学堂，如广东水陆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及昆明湖水师学堂相继兴办。与之相应的，是派